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

2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

〔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

2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3印张 298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册

统一书号: 10190·062 定价: 1.25元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 (2)

目 录

• 新时期文学述评 •

- 1 复苏的缪斯 徐敬亚
- 三年来诗坛的回顾及断想 徐敬亚
- 16 生活要求作家深沉思索 吴德安 戴锦华
- 近三年短篇小说思想初探 李 拔
- 24 “挽悼散文”的新收获 李 拔

• 创新与探索 •

- 33 争取高度的精神文明 孙绍振
- 试评张洁对美的探求 孙绍振
- 42 在生活矛盾中发现自己 洪子诚
- 王蒙近作漫评 洪子诚
- 51 一个人物的塑造突破了一个理论禁区 杨桂欣
- 读方之的《内奸》所想到的 杨桂欣
- 57 十年浩劫的一面镜子 潘仁山 郑日煊
- 评中篇小说《代价》 潘仁山 郑日煊
- 69 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看文艺创作的规律性 胡德培
- 74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她 梁化群 汪景寿 王卫国
- 略谈话剧《救救她》的创新 梁化群 汪景寿 王卫国
- 79 读马烽的《结婚现场会》 万平近

• 《当代文学史》选载 •

- 83 建国后十七年小说发展概述 陈美兰执笔
- 十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之一节 陈美兰执笔

• 作家与作品研究 •

- 90 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创造 刘建军 蒙万夫 张长仑
- 《论柳青的艺术观和艺术创造》之一章 刘建军 蒙万夫 张长仑
- 109 给人民以最好的东西 晓 雪
- 再谈艾青近作 晓 雪
- 123 在画山绣水之中 杨 义
- 论杨朔的散文 杨 义

录 目

(S) 肝丛突刊学文升兰

- 133 讴歌生活的美和诗意
——论闻捷的诗.....孙克恒
- 144 论《李自成》的艺术风格.....吴功正
- 155 真理的光辉
——读《燕山夜话》.....赵曙光

• 艺文谈 •

- 159 风格浅议.....郭志刚
- 164 从诸葛亮之死的描述谈起.....阿 君

• 作家通讯 •

- 166 艾芜同志关于《百炼成钢》与黄祖良同志的通信

• 当代文学资料 •

- 169 台湾省文学简介(下).....高 鹏
- 182 新中国文学纪事和著作年表(二).....仲呈祥



复苏的缪斯

——三年来诗坛的回顾及断想

徐敬亚

没有凛冽的寒冬，就不会有真正的阳春；没有疯狂的鞭子惊醒恶梦，就不会有真正的呻吟；如果血泊中不升腾起黎明，那便永远不会有激越嘹亮的歌声。我们应该感谢历史：正是在我们民族最迷茫、最窒息的时刻，天安门广场上，新中国的诗神在清明雨中猛然惊醒，爆出了愤怒的咆哮。之后，经过了一段短暂的沉默（那是黎明前的黑暗），一九七六年十月，她睁开了昏死沉沉的眼睛——

三个时期

“四五”诗歌运动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回首三年多以来我国诗歌走向新生的足迹，我们会发现：它大概是一年一个脚步，几乎与共和国的足迹重合着。

七六年十月至七七年末：欢乐的主旋。

历史好象故意为中国人民留出了一段欢乐喜庆的光阴。在一九七六年最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国大陆爆发了持久不息的举国狂欢。在那些历史性的记忆之中，人们不会忘记在北京频频举行的几次盛大诗歌朗诵会的场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诗人们获得了奇异的成功和声誉。《中国的十月》、《一月的哀思》、《周总理，你在哪里》——欢乐甚至把痛苦的往事、积郁的悲伤都染上了色彩。“周总理来参加我们的庆祝会”这句今天读来很平常的诗句，当年竟催下了那么多人的泪水，激起了那么狂热的欢呼！这

个时期，诗歌是有功劳的。

之后的一年中，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使诗坛上扬起一片欢歌。用不着更多地评论，只要看一下当时诗歌的一些题目就够了——《普天乐》、《万里东风》、《华主席的足迹》、《毛选五卷出版了》、《山乡新姿》、《欢乐的油海》、……，在批判四人帮的几大战役中，诗歌发出了很好的呐喊，但总的说来，这一年多的主调是欢乐。

诗，是社会生活中一条最敏感的神经。欢乐，巨大的欢乐，突然地降临，在其它文学形式尚且愕然之际，诗神却振开了神速的翅膀。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各种诗词、散曲、寓言诗，打油诗、讽刺诗等形式大量地被运用。诗歌的品类较之其它艺术形式最先得到了突破性的恢复。在所有文艺作品中，诗的数量也最多。与“文革”十年相比，它跨进了一步。相当数量的友人赠答、诗人杂感、甚至过去不得渲泄的日记诗、扣压稿的公开发表，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诗歌真实化的步伐。与“文革”十年相比，它跨进了一步。但总的看来，这一时期诗歌在艺术上没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相当数量的作品仍然停留在十七年乃至“文革”十年的水平。新生的诗神，呈现着明显的软弱，苏醒之初，她还难于唱出新鲜健美的歌声，如同一把刚刚转调的琴，只是在高音部上击打着欢乐和愤怒。不美的艺术，有时纵然得到历史和政治的推荐，也难

于陈列到艺术的宝库；没有深入心灵的歌，只能在生活的海洋上飘浮。这是第一个时期。

一九七八年：走向思考。

象一个在风暴中迷过路的孩子，我们的共和国在狂欢之后逐渐冷静下来，才蓦然发现自己正站在陡峭深渊的边缘，才久久地注视着周身被刺破的皮肉和褴褛的衣衫。全国科学大会和五届人大以后，全国人民对科学与文明的呼唤空前高涨，在憧憬美好前程的同时，诗人们的目光也逐渐放纵开来，开始回过头去，凝神地审视着我们民族的历史，眺望久违的世界，诗的格调普遍深沉了。

献出罗盘的国度，
却眼睁睁看着，
贼舰闯进了平静的东海，
中国泥土烧成的活字，
排出近代辛酸的历史。

……
西方的厂区烟囪入云，
为什么中国古老的石磨
还在艰难痛苦地呻吟？

这是一九七八年二月号《诗刊》上的歌啊，黄河长江的子孙（作者：毛志成）中的诗句，它以悠长的目光，挚切的情思，突兀于当世的诗坛，成为这一类诗歌的代表作品。其它歌啊，灿烂的星光（《诗刊》1978年第6期），以下凡引自《诗刊》的诗，只标明期数），悲吧，科学之鸟（1978年第2期），长江咏叹调（1979年第2期）都包含着对历史的回顾，对世界的注目，对现代科学的向往之情。诗歌开始试应着人民感情的变化，开始用自己的歌声感奋着沉寂的民族精神。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还不可能断然地摆脱传统的束缚而独立前行。虽然已经在捕捉着人民的感情，但呼唤往往停留在表面，在对社会的认识上，它还只是感愤于生活的褴褛外衣，很少关注衣服后面的伤痕，更没能很好地透视出可怕的生活内

伤。诗人们的诗情还总是在狭小的、限定的领域里旋转，多数诗还只是机械地为生活伴奏。语言中还夹带着大量生硬的政治术语和通行的空话。结构上还往往因袭着陈旧的套子。因此，有时大家不免唱着一个曲牌。千篇一律之作多；富于个性，振动社会之作少。今天，当生活登上了更高的台阶，回顾过去，我们应该努力排除因认识深入而增加的成见，应该客观地评价那一时期诗歌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在我们的目光尚处于被遮挡时对人们的启蒙。不可忘记在刚刚解冻的早春时节，诗歌曾将一股股暖流注入过生活的脉膊。过多的苛求是违反历史的，当时生活提供给创作的只有那么多。这是第二时期。

一九七九年，喷发的潜流。
七八年十一月，“四五”运动的平反，激起了全国民主运动的又一次汹涌浪潮。这一阶段思想大解放的洪流，对中国封建残余的冲击，历史将会给予越来越深刻地品评。生活的面纱揭开了，祖国胸膛上那还没有愈合的伤疤赤裸裸地袒露出来，诗人们激昂了，诗神几乎是冲开了切思想桎梏的羁绊，获得了喷发性的飞跃。新诗于长期的滞留之后，在时代的颤慄和激动中，才真正地起步了。

写出第一首好诗的是白桦。仅仅题目《阳光，谁也不能垄断》（1978年第12期）就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感奋不已。它本身即是一首新鲜的诗。

看！窗外正是明媚的春天，
快冲破与世隔绝的窗纸吧！
就需要那么一点。

一点就破呀！

百花盛开，阳光灿烂，

……

我们就象蛰伏在蛋壳里的鹰，

苏醒了，怎么能容忍窒息和黑暗？

……

听！我们正在用嘴敲响通往兰天的门，
就需要那么一点！

一点就破呀！

云海茫茫，太空蔚蓝……

……

只要再推动一下，

静静的积水立即会变成万里狂澜。

这是全新的语言，全新的诗情。形式上也更为自由的疏散，清白而又奇峻，闪着中国七十年代特定的生活气息。尽管今天看来，这首诗的后部分，还显得平冗、繁褥，但当时却不啻春风擦拭蓝天一般洗刷着人们心灵的蒙翳。它是诗人们第一声真正的呼吁和呐喊；是诗歌解放路上第一声雷鸣号角。

《在浪尖上》是老诗人艾青重新歌唱之后的第一篇。这首有些偏重叙事的抒情诗，证明了艾青的歌唱能力，但又象当年嗓音没有完全恢复的王昆一样，它没有足够地发挥诗人自己的特长，不免显得淡薄。而在《光的赞歌》中，不仅重新凸现了当年的艾青，而且证明了他的诗在血泪的磨砺中，更放射出了新的奇异。在最初歌唱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诗歌继续走在了前面——张志民的《按照人民的命令》，邵燕祥的《致窦守芳同志》，叶文福的《雷雨中的海燕》，雷抒雁的《他，歌唱在暴风雨的前边》，（均见1978年第12期和1979年第1期）献给四五的诗歌真是不胜枚举，似乎诗歌与四五运动有着奇异的亲近，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那时全国上下，新老诗人们简直是进行了一轮大合唱。闪着真实之光的四五诗风，如悬悬一线的激流，潜过了两年半的光阴，积聚的波涛又崩甸掀荡了。并且呈现着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带着灼热气息的诗，从新老诗人们的笔下涌出。其中徐城北的《四月五日的颂歌》（1979年第4期）是一篇小小的四五史诗；公刘的《星》（《上海文学》1979年第11期）在抒情诗中别具一格；张学梦的《现代化与我

们自己》（1979年第5期）抒写了我们生活中的新鲜主题；李发模的《呼声》（1979年第2期）李松涛的《没有完成的爱》（1979年第7期）则是小叙事诗中的代表；其中最长的要算郭同旭的《血与火》（一千四百多行。载1979年第1期《十月》）。

这是一个人民心声冲腾的时期，也是诗歌新生命充分萌芽的季节。优秀诗作开始层出：《不满》、《海之子》（这两首下文还要说及）、《珍珠》（1979年第10期）、《扪心篇》（1979年第8期）以及《光的赞歌》（《人民文学》1979年第1期），层层起伏的暴烈的诗情，鼓起了诗人们心中的风帆。一九七九年六、七月间披露的张志新事件，震惊了全国，更震惊了诗人。大量的唱给张志新的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专题，几乎每一个写诗的人都抒发了这个题材，千百诗人不约而同，至今仍绵绵不绝。回想起那《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熊光炯：1979年第8期）的年代，诗人们激愤难禁，捧着血泪控诉，捶着胸膛诅咒，产生了《小草在歌唱》那样思想上、艺术上都双映生辉的好诗。

如果说，从《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到《小草在歌唱》诗歌迈出了强健的两大步之后，那么叶文福的《将军，不能那样做》则是又一个开始，是从欢乐、沉思、呼唤中走过来的诗人们干预生活的一次强突破，在社会上产生了新诗三十年来不曾有过的影响和震动。这首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最新成就，是我们文学宝库中最优秀的诗作之一。今天，新中国苏生的诗歌正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地前进着。

天安门事件平反以来的一年多时间，对于中国诗坛是值得纪念的时期。——个性的解放，真实的血泪，冷静的思考，急切的追求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流特点。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诗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艺术上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再生和丰收。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前两年是过渡期，七八年

十一月之后是全新的局面。之前是惊醒后的欢歌，此后则是清醒的心灵的倾诉。诗歌再也不愿跟在生活的锣鼓后面咏唱，再也不是作为政治事件的简单陪衬，而是腾飞起来，驾着社会风云翱翔，有机地配合着政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独立地思考着生活。主题的凝重，题材的多样，形式上的探索、更新，其步伐都是建国以来任何一年所不能比拟的。下面主要就这一时期来谈谈三年来诗歌的内容与形式。

独特的情思

一个时代痛苦地过去了，留下了那么多的血泪和创伤。更为奇特的是，我们竟是带着满脸笑容——被扭歪了的笑容，走过了那瞬息惨变的风云。博大的自然实在是积累了过多的习题，变幻的生活实在是凝聚了过厚的疑云。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国土上，出现了那么多的人间悲剧？是什么原因？今后又该如何防止？这是风暴停息后，丽日蓝天下，历史铺开的试卷。每一个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人，都有负责为子孙们留下自己的注释。诗歌，由于它强烈的抒情性，所以也就比其它艺术形式更为直接地承担了这个使命。

要揭破历史的真实是困难的——它往往被裹在层层纠葛之中，而要把这种“真实”艺术地展现给人们却又同样是困难的。这不仅需要才能，而且有时需要勇气（当然也需要时间）。生活不能永远停留在对往事的回味和猜测上，它飞速前进的脚步催促着人们的答案。社会生活特定时期对文学艺术的这一特定要求，不能不使三年来的诗歌呈现出独特的主题基调和独特的表现形式。

一、思考，深深的思考

生活改变着我们的诗风。

三年来，从诗坛总的倾向上看，思索超过了讴歌，强烈的抒情盖过了对生活的单纯描摹。五十年代的那些闪着生活之乐的轻松小

调，六十年代超脱现实的慷慨高歌，不见了。纵情欢呼之后，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思索着痛苦的昨天，也思索着今天和明天。这种思索往往是从回忆开始的，诗中无时无处不弥漫着对血泪昨天的控诉……历史太让人难以忘怀了，人们不能不沉思着，即便是对今天的赞美，即便是对明天的向往，也往往伴着深深的回忆出现——

历史最怕回头去看

一看更教人惊心动魄

（王辽生，《雪花》，1979年第3期）。

是怎样发疯的年代呀

历史永远不能饶

（吴越，1979年第4期）

有些诗句相当精彩地描绘了走过风暴，走过动乱后的民族心理，诗人们确实向历史解答着：

十年

眼睁睁做了一场恶梦

幸而是睁着眼

我成了历史的见证人

（雷霆，1979年第12期）

笑声只归骗子霸占

连人民的哭泣也被强盗抢走！

（张新奇、贺梦凡，1979年第4期）

封建恶魔飞扬跋扈，科学的精灵暂避三舍。

专制、迷信被运用得空前绝后的出色。

（王唯章，1979年第6期）

形式主义

来到中国

快乐得发疯！

（曲有源，《芒种》，1979年第12期）

好笑吗？好笑。

但这种笑不亚于最悲伤的哭泣

（张新奇、贺梦凡，1979年第4期）

别林斯基说过：“文学有巨大的意义：它是社会的家庭教师。”①不能低估这些简短的

诗句，重大的史实往往伴着后代人对它的评价一起双双载入未来的史册。一个时代对于前一个时代的认识有多么深刻，它就能在前一个时代的基础上迈出多么大的步伐。在举国沉思，痛定思痛的年头，人民憋着满腹的话。诗人们捧出了无数个问号，无数个叹号，抽象着社会的教训，升华着人民的思考，那灵感的琴弦上奏出的颤音，会神奇地拨点心灵。这些血泪的结晶，对于人民迅速而深刻地认识过去，从而更有力地迈向明天，谁能估量出它能产生出多大的启蒙和推动呢？

的确，诗人们的认识是独特的——

当傍晚华灯爆发出万丈光芒

却成为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霎！

（徐城北，1979年第4期）

象这样的思想认识，一般人并不难具备，但这样的对比，这样强烈、深刻的判断，却令读者（哪怕是聪明的读者）猛醒和震惊！

他妈的！

既不准大声地笑

也不准大声地哭

.....

那.....

就慢慢地、微微地点个头

仿佛虔诚得象一个

狡猾的和尚

（黄永玉，1979年第5期）

这几句诗对十年中人们的遭遇、感情的变化展示得多么生动准确。“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②诗歌总是流露着生活所赋予的必然色彩：

我要撩起海水洗净苍天

我要撕裂胸膛，让大浪冲刷内心的悲哀

失去爱情的痛苦，蒙受耻辱的期待

转化了吧，我爱大海，我爱大海！

我送走了没落的红日

满天的星斗凝成了天上的海

把固执的成见，禁固热情的壁垒

用生命去撞开！

（都郁，《海之子》，1979年第7期）

这是痛苦的呼叫，跺着脚地诅咒那过去了的年代，向往未来，感情是悲壮的。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情调只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它是十年奇特生活在人们精神上的真实反映和遗留。我想，三十年代的诗人们一般不会这样写悲哀，他们有的多半是孱弱无力的呻吟：

攀了杨柳

捏了一把杨柳泪

而六十年代的诗歌中，干脆就不存在悲哀（实际上是不允许存在）

红日出东方

光芒照四海

伟大的人民

革命壮志满胸怀！

不仅仅是回忆、暴露，就是对新生活的追求和歌唱，在四五运动平反之后，也呈现着完全不同的基调，想像往往都很放达，诗情独特、清新：

我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肺

好大口、大口地来呼吸

（刘镇，1979年第1期）

诗人们对于祖国再也不是满足地欢呼而是更殷切地希冀。请看一首小诗《写在机场》，只四行。

走完了长长的跑道线，一个急转弯

巨大的引擎终于摆脱了地心引力的羁绊
起飞了，飞机轻轻抖动银色双翼钻入蓝天
我的祖国呵，你那漫长的跑道该已走完……

(沙白，1979年第7期)

很明显，诗歌的力量在加强。诗人们不
只是生硬地重复政治家提出来的现成的口
号，而是把那些沉甸甸的思想结晶形象化，
更强烈地呼唤生活，更生动地指导生活，用
自己的诗情教育着整个社会。

把被我们民族随意撒掉的珍珠拾起来
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民。

(白桦，1979年第10期)

人民需要的是盾，对付敌人才用剑
二者永不颠倒，国土上便根除了人为的灾
难

(满锐，1979年第2期)

三年来，诗歌中的“诗情”确是崭新
的、独特的。像五、六十年代那种先写春
天，再写人，最后一个“联想”：我们就象春
天。或先写田野象地毯，再写姑娘绣花，最
后一“升华”：我们的拖拉机正绣着生活的花
衣……诸如此类的“诗框”早已容纳不了新
的奇特的生活。在今天，不认真地思考，不
提炼新的诗情，是断断登上不诗坛的。

三年来，中国社会由动乱转为安定。在这
恢复期也是历史更生期里，诗歌的思想性突
出地增强。诗人们甚至比社会平和时期的思
想家费去了更多的思考，更多地关注社会重
大问题。涌现了大量的过去年代里诗歌不曾
涉及的新鲜主题。在拉直生活巨大问号的过程
中，人类的“悲愤心理”得到了比较充分的
揭示；一个民族觉醒后的“自强心理”得
到了较多的抒发；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
比起过去，诗人们有了更足够的估计和抒
写，对黑暗势力有了更深刻的体验；整整一

代的诗人对真、善、美重新进行了认识和歌
唱；诗人的笔在短短的时间里充分地评价
了十年的血泪生活，把中国人民理解社会的
水准提到了最新高度（即便是那些昔日被无
数次吟咏过的主题，也得到了更深刻地加
强）。但同时，正因为在这个非常时期里，人
民的感情、社会的风尚正在艰难地恢复和开
创，所以在诗篇中竟较多地出现了某些“人
生公理”甚至“社会常识”。诗人们不得不
用相当多的笔墨为那些并不很高深，并不得
奇妙的常识性道理作辩解找注脚，与人民一
起重新理解生活的内涵（例如《阳光，谁也
不能垄断》的后部分，《不满》的前部分）。这
是社会处于长期压抑之后的必然现象。三年
诗歌的上述特点，完全符合生活发展的曲
线，这一切都源于我们民族的这一次解放与
更新，新诗正是在历史的变迁中得以清醒与
再生。

二、两首诗

正是从四五运动中我们的诗歌才愤怒地
甩开了那蒙着华丽罗裙的“欺骗”，开始向
“真实”大步地靠拢。正是在深深的思索之
中，它才一步步地吻合着人民的心声，产生
了一首又一首能映照出我们时代面容的优秀
诗篇。在三年来众多的诗作中，在纷杂的内
容里，我们看两首诗。第一首《回答》，写于
七六年的四五运动——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北岛，《1979年第3期》。)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声音与形象，是生活磨炼出来的吓不倒也更骗不了的年轻灵魂们的自白。完全可以说，这是对“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判决，是那黑暗岁月的葬歌。三年之后，生活经过了阵痛和思考，另一位青年诗人唱道：

像鲜花憧憬着甘美的果实，
像煤核怀着燃烧的意愿；
我心中孕育着一个“可怕”的思想，
对现状我大声地喊叫：
——“我不满”！

这是刊在《诗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号上的《不满》（作者骆宾野）。我认为，这是最能代表一代人追求的呼声（只是代表“追求”）。

谁说不满就是异端？
谁说不满就是背叛？
谁说不满就是不爱？
谁说不满就是抱怨？
谁说不满是背弃出类拔萃的先人？
谁说不满是亵渎德高望重的圣贤？
——不满正是对变革的希冀。

不满乃是那创造的发端。
两首诗同是直抒胸臆，一个是黑暗的叛逆，一个是变革的呼声。我们看到，时间经过了三年，对旧世界的那种鄙睨地回答，已经变成了对未来的巨大渴求，这也正是我们民族在曲折道路上的两个身影，这也正是诗

歌的镜头对时代精神所作出的忠诚而精彩的反射。
“不满”几乎是囊括了我们民族苏生后的全部希求。它不仅面对自然界，而且面对着社会。诗人写道：我是电流，我是高炉，我是庄稼，我是市场，我是年迈的城镇，我是拘谨的生活，我是低产的田地，我是发紫的肩头……“我不满：步枪，不满：水车，不满：帆船，不满：泥泞，不满：官僚主义，不满：软弱的法制，我抗议马拉松会议，以时间的名义，我控诉宗教式的软禁，以真理的呼喊……”这纵横恣肆的追求，这博大的气势，让人想起了屈原的《天问》，让人想起了郭沫若的《天狗》和《晨安》。这一连串的不满，是对贫穷的拒绝，对愚昧的否定，是对保守的抗议，是对变革的呼吁。一字一句都充满了对科学民主、对美好生活的急切向往。

不满就是一个绝妙的议事日程，
不满就是一部崭新的行动提案，
不满象两个矛盾间过渡的桥梁哟，
不满象一粒细胞中产生的裂变；

这两首诗，最能代表三年来我们诗坛的主题格调。无论是天安门事件，张志新事件以及歌唱新生、批判四人帮的大量诗作，都包含在这个递进着的主题旋律之中。我们的诗，开始是对黑暗的反抗，反抗后则是胜利的欢乐，欢乐后是控诉和思考，思考中诞生着追求——这就是我国新诗三年乃至数年来主题变迁的全部脚印。正像白桦在《珍珠》诗中说的那样：“三十年来我们民族磨出了一颗珍珠：觉醒。”这也正是三年来诗歌中贯穿始终独特的情思。
独特的形式

世界上没有一个重复的春天。生活永远不会原封不动地迭印，艺术之神永远不会

着同一个调子。奇特的生活不管经过多久的空白，总要被谱成奇特的歌声。十几年来，社会生活的巨大断裂和扭曲，为诗人们提供了膨胀的诗情，却并不能提供现成的形式，旧的形式对于新的生活总是不合脚的鞋子。新的思考在开始之初，也许只好披着传统的外罩，但是，终究要胀开它、撑破它，到新的天地里去编织新的衣衫。三年来，新诗在寻找新的表现形式。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郭小川、贺敬之、李瑛等创立的风靡一时的抒情诗形式，不能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暗哑着。诗人们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不约而同地在诗中揉进了深深的哲理。一时间，中国诗坛上大量的哲理诗、寓言诗、咏物诗、断想诗、讽刺诗、寄情小札等突出地兴旺起来：人们借穷山恶水抒发愤闷，借晶日长空畅想未来——诗人们诅咒牵牛花的大喇叭（因为曾出现过害人的巧嘴）；诗人们控诉豺狼和暗夜（因为生活曾流过血泪，迷失过道路）；同时诗人们也赞美青松、赞美小草，向它们倾吐着敬意（因为它们遭受了弥天的风暴）；正因为我们的人民曾被可悲地麻醉了十年，艾青才对“神秘果”“写道”：

据说，“吃了神秘果
再吃什么都是甜的。”

.....

要是我们不知甜、酸、苦、辣，
活着，还有什么滋味！

（1979年第5期）

艾青的《光的赞歌》是一首纯粹的哲理诗，白桦的《风》（1979年第8期）也与之类似。这种杂诗、小诗的增多，这种较大型的哲理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一场大的社会动乱之后的必然产物。生活原有的习惯松塌了，巨大的欺骗揭开了，人们一时还理不清思索的脉络，对过去的生活，整个社会一时还拿不出很多完整清晰的结论。在这

样的历史阶段中，人们的感想往往是零星的、片断的，但却是尖锐的强烈的。有的一时还不能系统地表达，有的则是囿于某些局限，一时不便于明确表达，所以便寄言托物。因此，三年来寓言诗，哲理诗的增多是可以理解的。直接反映现实的诗，生活色彩较浓的诗作一直很薄弱，因为国家在新旧交替中前进，生活飞快地更换着面貌，疲惫的老诗人和艺术上较为浅薄的青年诗人还不能很好地、很快地概括出这个博大、变幻的社会局面。生活没有整理好队形，诗歌的脚步也必然纷乱一些，因此三年来没能产生大型的史诗性作品也是正常的。没能产生出象当年贺敬之那样的长篇抒情诗，也是必然的。至于为什么近年来寓言诗如此盛行，哲理味儿增加，甚至出现了《在历史的法庭上》（杨牧，1979年第11期）那样新奇的形式，诗的门类多种多样为三十年来所没有，原因诸多方面（例如我国古典诗词向来有托物言志的传统），但根本症结还是应该研究分析这三年特定的生活，研究人们的特定心理。我想，这种形式恰恰正是对这种生活内容的完美适应。

在短暂的时间里（三年，其实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要想形成一些成型的艺术流派是困难的。只有众多的在继承与革新上孜孜以求的探索者，以鲜明的个性在科学与民主的气氛下自由竞赛和不断发展，一个个崭新的风格流派才能真正形成。但目前诗歌界中的某些倾向却值得注意。比较一下一年多以来的各种刊物，不难发现：诗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诗刊》为中心的新的流派（确切说，应该称为一股创作风气，一种新的倾向）。现在，要准确地概括出它的特点还较困难，但可以勾勒出大概的轮廓，那就是：哲理性的抒情，对生活的大幅度抽象概括，追求现代化的表现手法，抒情角度的变幻多样，过渡与叙述的急剧跳跃，语言的平白无华。公刘、白桦还不能作为它的代表（虽然

他们的诗带着较浓的色彩)众多的新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才是这一倾向的涓涓细流。(我称之为“创作倾向”,是因为它目前还不能形成清晰的特点,尚不能推出代表人物和大批一致成型的作品)他们风格上更接近于艾青,比较纯粹的典型诗作不很多,各种特点还散见于各种诗中。

我不需要怜悯——

因为被糟踏的青春;

因为被扭曲的畸形;

.....

不!我不需要怜悯!

我不需要悔恨——

我喝过了狼奶,

我能辨别狼味的膻腥;

我迷恋过毒蛇,

我能记住蛇皮的花纹;

.....

不!我不需要悔恨!

(田稼春,1979年第8期)

其它比较典型的还有:《不,不是一切》(1979年7期)、《扪心篇》(1979年第8期)、《以前我们是诚实的》(《芒种》1979年第12期)。这些诗的作者再也不愿重复那些令人厌腻的老调,从语言到构思都表露着明显的追求。他们重在抒发一代人的生活感受,构思上试图突破传统的铺排手法,表现主题时,更多地选用零星细碎的形象,运用高度抽象化的朴素语言。抒情角度往往新奇不凡,给人以特殊的回味。例如写给祖国的诗真是太多了,但是一位年青的女诗人却这样写: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几百年以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牵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膀;

——祖国啊!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

我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1979年7期)

这首诗的抒情角度,与《不满》很有些相象之处。他们追求着诗歌新的表现手法。新鲜的比喻,大胆的联想,奇特的词语组合,是这一类诗在语言修辞上的特点。请读一首《巴黎公社》的开头一节:

奴隶的歌声嵌进了仇恨的子弹,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花瓣,像血滴,

贴在了地球蓝色的额头。

(方含,1979年第3期)

跳跃性较大的(外在形象与内在逻辑):

阴谋和匕首,

藏在背后,

昙花无忧无愁,

一个影子慢慢延长,

生命却缩短到最后.....

.....

在这页历史之中,

我停了很久、很久,

感到恨?感到仇?

不!是强烈的惊悸跳出胸膛:

“民族,看看你的背后!”

(顾城,1979年第11期)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如果当人们感

觉到它的时候，其实它早已完成了酝酿，甚至已经萌生好长时间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新的倾向，目前还难以命名。它带着较浓的哲理味儿，写法上吸收了西方象征派和中国现代派诗歌的某些特点。它可能只是某一个时期的产物和存在，当新的生活重新大步开始的时候，它可能让位给更新的风格。但是不能不看到，今天它确仍在弥漫着诗坛。作为一种创作苗头，它既然冲破了传统的束缚登上了诗坛，那么它就一定带来了某些新鲜的创造。可惜的是，当前理论界至今没能给予很好地发现与研究。其实很明显，在诗歌界（事实上不止诗歌，电影、美术、报告文学、小说等体裁都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存在着新旧两种风格的交杂与竞争。人们不难看出，《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与《诗刊》上的诗，无论是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迥然相异（从整体上说）、各地刊物的风格特点也正在凸现，并分别向这几家靠拢。总的看来，新的流派、新的表现手法呈现着上升的趋向，越来越夺取着优势。

最后，在总结三年来诗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以来，全国除恢复了大批正式刊物外，在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非正式刊物（包括内部刊物、自办刊物）。这是三年文艺发展中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是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它标志着我国文艺新的繁荣趋势。这些刊物上的文艺作品理所应当地应归入三年文艺创作的行列，（并且应该是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广，足可以与五四时期突发兴起的报刊相媲美，而接近于三十年代的某些特点。这些刊物主要有三类：其一，全国各省市的文联、各地区、县的文化馆多创办了在自己所辖范围内发行的杂志；其二，是大专院校里新涌现的大学生文学社团或学生会办的课外刊物；其三，是城市中以工人为主的文学青年自费

筹办的文艺刊物（这类数量较少）。估计三者的总数有几百种之多。他们办综合性文艺刊物，也办诗刊、诗报。其中多数作品还不甚高超，不免幼稚、粗糙和生涩，但却显得更为活跃，更为敏感。但是，由于多年来的文艺禁锢，由于社会生活特定时期的要求，使得这类文学现象与整个社会还存在各种不协调之处，对于这种文艺的新繁荣形式，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我们的文艺部门和行政机关，还很不适应，很不习惯。如何整理、如何指导，用什么方式去推动、发展，有待于各方面的研究指导。作为文学现象，它表明了我们民族文学素质和文学兴趣的极大进步。一想到这一点我便从心里头高兴。

在诗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可以举出四家。贵州省绥阳县文化馆主办的诗报《喷泉》（已出八期）；北京青年办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今天》（已出六期）、杭州大学中文系“杨帆”诗社办的诗刊《杨帆》（已出十三期）。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言志》诗社办的诗刊《赤子心》（已出六期）这些当今中国诗坛外的小小园林，确实是开放着一批新鲜的花朵，这里录《杨帆》上纪念张志新的一首小诗：

她倒下去了，那么沉重

像陨星坠落在地球

历史躲闪不及

被砸开了一个深深的伤口

……

她倒下了，倒在法律上

法律惊醒了，抖落满身的污垢

她倒下了，倒在民主上

民主复苏了，扬起刚强的额头

她倒下了，倒在真理上

真理跳起来，一声大吼……

（肖蔡，《杨帆》第11期）

特别值得诗歌界和评论界注意的是北京青年办的《今天》，其中确有几位颇具才气的青年诗人，并且基本形成了自己刊物的特点和自己诗歌的风格，他们堪称诗坛上的一个小小流派。在青年们中间影响较大。甚至《诗刊》也接受了它的一点感染，比较敏感的文艺刊物对他们给予了介绍。（一九七九年一年中，《诗刊》选了它们四首诗歌，八〇年第一期《安徽文学》选登了他们四首诗歌）。其它刊物如《长春》、《福建文艺》、《东海》）也将陆续选刊，有一首诗这样写青年们十数年来的经历、收获和现状。

我有一块土地

我有一块被晒黑的脊梁

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

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

我有一块土地

我有一块被耕种的头盖骨

我有容得下天空的脑海

我有无比深情的爱

文学上新的流派产生的原因往往是复杂的，成长也往往是艰难的。这些“局外之作”应看成是整个诗坛新的风格、倾向的社会基础和重要分支。在这些刊物上，大量的青年作者受到的局限较小，能够比较自由、大胆地探寻，新的风格在这里易于滋生。从某种角度（例如文学史）夸张地说，它们似乎可以算当代的“汉乐府”，或许可以说是现代社会里民歌的特殊形式吧。

总的回顾及对新诗的几点看法

或许是由于历史偶然的重演，或许是由于艺术发展道路上必然的曲折回环，科学和民主成了近三年来诗歌中最响亮的主题，新

诗在最新的发展中竟然出了最初阶段（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很多迹象。这期间，政治抒情诗几乎独霸了整个诗歌园地，诗的浓度普遍增加，诗的力度大大加强，诗的个性得到了迅速的突出，寓言诗、哲理诗、托物诗及各种小诗的大量出现，是对我国新诗长期以来单一品类的历史性补偿；经过长期积蓄和斗争，诗歌终于初步战胜了它的最大敌人——虚伪和欺骗。过去三年，诗开始说真话了，或者说，开始说了一点真话。这是三年来诗歌的最重大的收获。惨痛的历史像一勾弯曲的犁，无情地耕开了圣洁的诗坛，翻出了乌黑不毛的沃土，真正的生长总算开始了。完全有理由这样说，三年来的诗歌主流，是四五诗歌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前面诗生活唤醒了一代人。新作者的大量涌现是三年来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一代青年的觉醒，在诗坛上得到了比较明显的表现。这是一个令人心潮激荡的年代，新的探索尝试在等待着勇敢而智慧的人们，青年又是热情迸发的时节，诗神最乐于驾驭青春的翅膀，一大批年轻诗人的异军突起，为诗坛增添了生气。这三年里，中青年诗人成了诗坛的主力。蔡其矫、公刘、白桦、邵燕祥、孙静轩、雁翼、刘湛秋、刘祖慈等是活跃在诗坛的中年诗人。雷抒雁、叶文福、曲有源等用一阵比一阵强烈的歌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近年成长起来的诗歌新人徐刚在三年中也写了大量诗篇。女诗人郑晓钢的爱情诗正引起人们的注意。老诗人的声音弱了下来，继续猛烈燃烧的只有富于哲理的艾青。与老一代诗人的退出相对比的是不可胜举的无名青年诗人的涌出。这批新人，虽尚待社会的进一步选定和熟悉，但其数量之多，来势之猛，对社会对人生理解之深，艺术表现力的起点之高，是新诗六十年中几批青年诗人们所没有过的。这批队伍，以每省十名计数（这是很精的推选），全国便约有三、四百人之多，这是多么庞大的新生力量呀！他

们是我国新诗的早霞。社会将会给予他们崇高的承认。

别林斯基说过：“要想把好的诗句从坏的或普通的诗句挑选出来，只要有素养和文学的敏感就够了”^③。尽管上面我们摘录了一些较好的诗或诗句，但是象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样众多的刊物和诗人，几年的光阴，满足于几首好诗实在是太可悲了。三年来诗坛上有了收获，但只是结出了第一颗不很成熟的果子。比起我们丰富无比的生活，诗歌还显得那么孱弱和微小。真正的好诗仍然是极少数，充塞报刊、杂志的还是那些枯燥的、没有新意的、重复的、一目了然的宣传诗。叙事诗的收获不太大，在突进激烈的生活面前，民歌表现了它轻柔的软弱；抒情诗中的个性还相当模糊，大多数的诗还呈现着严重的艺术上的贫血。在历史的疑团面前诗人们（特别是青年作者）还多少凭借着勇气取胜，艺术上的薄弱是普遍的通病。由于感情的强烈喷发，使得很多诗人不暇修饰。（如《艺术在大声呼唤》，1979年第7期）艺术上的粗糙，虽然当时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但却经不起时间的推敲；诗歌中的感情，自然流露的较少，直呼大喊的过多。时代的色彩应该是从字里行间透出来的，可惜我们相当多的诗，还是靠刷上去或染上去的，因此朝生暮死的作品还是太多。总的看来，刊物上诗的质量上来了，广播、报纸上的诗总是慢慢地踏步。某些作者在追求新奇的时候，既不想因循旧的轨辙，又一时不能驾驭新的技巧，有些作品不免不伦不类，在具有现代色彩的新流派的萌生之中，也有某些晦涩、模糊、脱离生活的倾向。

当前，在各种文艺体裁中，诗歌的地位差不多是最低下了。社会上几乎形成了一股风气，不读诗，不买诗，谈起诗就摇头，有些人把诗歌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令每一个写诗的人、爱诗的人难过的事情。固然，诗歌声誉的下降是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以来

诗歌创作脱离人民生活、背叛人民感情的结果，但是任何人也不应该无视三年来诗歌的成就。至于诗为什么不能占有众多的读者？不能广泛地流传？这倒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谈到诗歌现状，人们总爱把它和小说相比，其实这是不好相比的。首先因为小说在这些年遭受的摧残（包括被利用）较诗歌要小一点。数百年来中外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还是比较强大的。而且新中国的小说创作有五七年干预生活的尝试。这一切使得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恢复较快，成效较大，而新诗则不得不重新修建炉灶，甚至不得不从三十年前、六十年前起步。从创作特点上看，在今天“客观描绘”仍然比“主观抒发”更为容易准确一些，因而作家们的笔也就更显得自由活脱一些。其次，社会风尚的萎靡待振、文化水平的相对低下，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诗歌的流传。小说可以凭借离奇的情节，吸引人的人物遭遇夺取相当多的读者，甚至吸引无所事事的青年。而诗歌对读者有着较高的要求，它的欣赏往往需要思考。对于费思考之作（应该承认）有些人是不屑一顾的。我们虽然不能借此为诗歌开脱罪责，但至少在某一历史时期里某一种文学体裁相对地得到风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令人不安的是，在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化史的诗国里，诗歌长期不甚景气。（有时被视为粪土），这简直是令人感到可悲的事情了。在新诗发展的六十年中，还没有出现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热爱和崇拜普希金的盛况。这使我想起了别林斯基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论述。他说，普希金提高了整个俄罗斯的审美能力，他那种聪明的、优美的人情味儿给人们带来了诗的声誉，普希金的诗使俄国喜欢了诗。（大意）这从另一个方面给了我们启示，那就是说，埋怨读者的热情是不对的。诗歌社会价值的跌落，其根本原因只能归于诗歌创作本身。人民不是不爱诗，他们